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

首次专题学术讨论会
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论文选

一九八七年九月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

首次专题学术讨论会
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论文选

一九八七年九月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首次专题
学术讨论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目 录

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	耿曙生 (1)
0论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确立和当时 <u>扬州地区</u> 流通 过的铸币·····	秦子卿 (10)
再论吴国货币形态·····	周公太 (18)
秦国币制考析·····	臧知非 (24)
齐六字刀文之臆证·····	李人俞 (33)
北洞山钱币初析——兼论半两钱的有关问题·····	金 澄 邱永生 (34)
东汉货币经济兴衰的再探讨·····	王 健 (43)
出土古币东汉五铢阴文“十”字·····	高建础 潘绵虎 (59)
略论三国两晋时期的钱币·····	查瑞珍 (61)
三国吴钱初探·····	刘建国 高 岚 (68)
南朝货币和经济发展·····	罗宗真 (89)
萧梁铁五铢浅析——兼论钱币生命周期·····	邹志谅 吴根生 (95)
浅谈隋五铢的发行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狄兆霖 (102)
试论唐代货币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陆龙生 梁爱中 (105)
论唐代中晚期的蓄钱之禁·····	朱祥云 (110)
南唐货币概论·····	陈延斌 (116)
略论两宋的货币经济·····	戎东亚 (124)
宋钱出土分析·····	殷光中 (135)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纸币产生原因的探讨蔡则祥王培英·····	(142)

茅山出土南宋金牌的再探讨·····	赵 平(150)
宋代“对钱”初析·····	马鸣远(157)
两宋的铸钱监·····	吉金顺(159)
朝阳金代窖藏时代背景的分析·····	刘洪石(169)
一种有特殊职能的钱币——元代“至正元宝”	
权钞钱浅述·····	陈泰山 高石丁(173)
元代货币购买力初探·····	姜观吾(175)
明代铸钱传世不多的原因初探·····	吴敬农(182)
论明末清初汇票·····	叶卫国 张学明(184)
清代铸钱初识·····	吴 进(193)
太平天国货币铸造述略·····	吴晓晴 蒋晓星(196)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始末·····	安 宇(202)
试论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	季长佑(205)
“西港玉壶春根记”钱筹查考浅议·····	孟引祥 陈钧楨(217)
华中币浅见·····	杨勇伟(219)
盐阜银行盐阜币的发行简述·····	熊 烈 龙 雨(227)
略谈淮海银行及其货币·····	周士艺(235)
江南银行货币与江南印钞厂·····	金 诚(238)
苏南茅山地区惠农银行的建立和发行抗币·····	徐鹤筹(246)
关于抗日战争初期管文炳同志在访仙镇发行货币流通	
券的追忆·····	汤通庆(255)
宜兴县解放初期的货币流通——兼谈我县人民币统一市	
场形成的步骤及措施·····	费鍾麟 谭东平(257)
对早期人民币膨胀的控制(上海和苏南	
地区: 1949年5月——1950年3月)·····	汤可可(264)

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

耿曙生

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这在学术界似无疑议。不过，贝在我国何时才真正具有货币的职能？目前仍有较大的分歧：千家驹认为，我国在殷商以前贝已作为货币使用了；①萧清认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为夏代；②郭沫若认为，贝作为货币的时间，约在商周之际；③郭宝钧推证，贝作为货币是在周穆王以后。④以上诸说，不敢苟同，依本人陋见，贝成为中国货币的年代应为商代。

在我国，贝早在河南仰韶村、朱家寨、山西礼教村、青海柳湾等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就有发现。⑤但当时人类正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人们的生产只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因而不可能有多余的产品来进行交换。即使有偶尔发生的交换，也只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这个时期的贝无疑不具备货币的职能，它仅仅被作为极为珍贵的装饰品为人们所喜爱。

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产品的交换也随之而经常化，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份。根据古文献记载，我国至迟在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已有了定期的大规模的产品交换。“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⑥但

是，这种交换直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时代仍然是“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⑦的物物交换阶段。当然，人们在经常的交换过程中，会发现某一种物品是大家所共需的，就利用它来作为交换媒介物。这种媒介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等价形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物货币。这种等价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是“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或那种商品承担。”⑧就我国而言，最初作为实物货币的就有牲畜、粟、布、贝等多种形式。但这个时期的贝和其它的实物货币一样，还不能称为真正的货币。尽管它已具有了价值尺度的职能，但它自身仍然是商品，人们注重它的仍然是使用价值——即装饰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原始社会末期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贝也不可能脱离实物货币的范畴而成为真正的货币。

夏代我国已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但古文献中对夏代的记载皆语焉不详，考古学中的“夏文化”还未能确定，因而我们对夏代的社会状况还不能较为详细的了解。我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虽曾发现了十二枚海贝。⑨但这个遗址是否全部为夏文化，学术界仍有很大争议。⑩即使这十二枚海贝为夏代的遗物，但也不一定已成为货币。因为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夏代有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不能肯定。因而贝在夏代已成为货币是缺乏可信的依据的。

如果说，贝在夏代已成为我国的货币还缺乏足够的证据，那么在商代，我们就有更多的材料足以证明它已具备了真正货币的职能。马克思对货币的形成曾作过精辟的阐述：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⑪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我们认为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又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客观体现。我们要论证商的贝已形成为货币，就必须要对商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状况进行分析，看商代是否已具备了产生货币的条件。

（一）商代已有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已具有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我们在河南郑州商城南北各发现一处制铜作坊遗址，城南的总面积为1050平方米，⑫城北的面积约为275平方米。⑬在郑州商城还发现了一处面积有1400平方米左右的制陶作坊遗址。⑭再如安阳殷墟，1958——1959在苗圃北地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其总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三、四千块，在北辛庄发现了一处制骨作坊遗址，仅开掘的面积就有240多平方米，在其中一个椭圆形的骨料坑中，出土的骨料、半成品等就有五千多件。⑮再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这件巨型铜器，显然非一般简单操作方法可以铸成。据邹衡先生研究，铸造这件青铜器需要三百人左右同时协调操作。⑯

商代这些手工业作坊遗址和产品，无疑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规模。

商代手工业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各种手工业内部已有了比较细的分工。例如，郑州商城南的铸铜作坊遗址中主要出土镞范和斲范。郑州商城北的铸铜作坊遗址中主要出土刀范和戈范，可见这两处铜作坊的主要产品似有不同，说明当时青铜铸造手工业内部已有了一定的分工。^⑮再如，郑州商城北曾发现了一处制骨作坊遗址，在其中一个窖穴中发现的一千多件成品或半成品绝大部分是镞和簪，显然这是一处以制骨簪和骨镞为主的作坊。^⑯安阳北辛庄发现的一处制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成品和半成品以骨笄和笄帽为最多，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制骨笄为主的手工业作坊。^⑰同样以制骨笄为主的手工业作坊在安阳殷墟的高楼庄、薛家庄两地也有发现。^⑱说明当时制骨业中已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

从商代发达的手工业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代已有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特别是一些有固定分工的手工业作坊，单一产品的生产，产品的数量是相当大的，显然不是供作坊主自己使用的，而是为了交换，这种直接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无疑是一种商品生产。

（二）商代已有了发达的商品贸易。

商代手工业进一步的分工和商品交换进一步的发展，使社会再次发生了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层——商人”。^⑲商代的商业是相当繁荣的，商人也十分活跃，这在古文献和考古材料中都能得到一定的证明：“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⑳“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

化之。”^{②③}“肇牵车牛，远服贾”。^{②④}“旅于处，得其资斧”。^{②⑤}“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②⑥}我们在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中曾发掘到大量海贝、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大龟和玉制品，这些东西皆非本地所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无疑是交换而来的。^{②⑦}特别是其中的玉盛产于新疆，海贝和大龟盛产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可见商代已与遥远的外地有了广泛的贸易联系。

商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刺激商代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说：“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②⑧}商代的亳、殷、朝歌等城市，不但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在这些城市中是否有专门商品贸易的“市”，从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得到证明，但从古文献中可以看到，商代城市中已有了专门交易的场所——“市”，市内并还有各种的“肆”。据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②⑨}“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灸。”^{③⑩}“若挹于市”。^{③⑪}殷代铜器铭文中也有“市”字的出现。^{③⑫}正因为商代城市存在着市、肆，所以“市”、“肆”、“邑”、“邑肆”之称不绝于盘庚之口，如所谓“以迁肆”，“其永地于兹新邑肆”等。^{③⑬}商代城市中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市”的出现，无疑是商代商品交易繁荣的现实反映。

商代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无疑有力地促使了货币的形成，为“贝”成为真正的货币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这个时期，最初的“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或那种商品

承担”^⑤的一般等价形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⑥它究竟固定在那一种商品上呢？因为我国最初的实物货币曾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产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⑦正如马克思所说，贝之所以成为商代货币，是由于贝非商王国版图内所产，是外来交换品，而商人要想得到它，就需要长途跋涉，花费大量的劳动；贝有光泽、滑润，是很好的装饰品，因而它有使用价值；同时贝又有便于携带、保存、计算等优点。因此，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它就被赋予“货币”的职能，并逐渐代替了其它的实物货币，成为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

我们再通过对商代的贝进行考察，证明它当时起码已具有了以下四种职能：

（一）价值尺度的职能。“或益之十朋之龟”。^⑧

（二）流通手段的职能。甲骨文中有“买”，虽写法不同，然皆具贝形。故《说文》曰：“买，市也，从网贝”。网贝有市利之意。

（三）贮藏手段的职能。甲骨文有“贮”、“𪔐”等字。“贮”字，即将贝贮藏于容器之中。“𪔐”字，似积贝储木篋中。

（四）支付手段的职能。“怀其资，得童仆”。^⑨资从贝，可见贝可以充作买卖奴隶的支付手段。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还常见用贝赏赐的记载，赏赐也是一种支付手段。

如果拿商代的贝和现代的货币相比，它除了没有世界货币的职能以外，其它四种职能都已具备，即达到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最初货币的全部职能。

贝作为货币在商代已普遍使用，这从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证实。

商代的墓葬中，我们无论从王公贵族的大墓还是一般奴隶主的中型墓，都发现有殉贝的现象。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座商代大墓中（M₁），曾殉贝3790枚；③⑨安阳小屯一座中型墓（M5）中，亦曾发现6000多枚殉贝；④⑩近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亦殉贝近7000枚。④⑪这些奴隶主贵族，无疑已把贝作为一种财富来敛聚。一般平民墓葬中也不乏殉贝现象。例如，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160座平民墓中，83座殉有贝；④⑫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800多座平民墓葬中，有336座殉有贝。④⑬甚至在少数奴隶的乱葬坑中也殉有一、两枚贝。④⑭这些现象无疑反映了商代的贝已作为货币在整个社会上广泛流通，占有贝的多寡，不但反映了墓主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而且还反映了占有者的身份和权力。

综上所述，我国只有到商代才具备产生真正货币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背景，贝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形成真正的货币。

注释：

①千家驹：《中国历代货币·序》，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②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④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⑤参见：Anderson, J. G,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1934；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⑥《周易·系辞》

⑦《淮南子·齐俗训》

⑧⑪⑲⑳㉔㉕㉖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⑩殷伟璋：《有关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1984年第2期。

⑫⑬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⑬廖永民：《郑州市发现的一处商代居住与铸造铜器遗址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

⑭安全槐：《郑州地区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⑮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⑰⑱⑲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㉑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第31页和《考

古》1969年第4期第214页。

②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②《易·系辞》

②③《管子·轻重戊》

②④《尚书·酒诰》

②⑤③⑧《易·旅》

②⑥《易·无妄》

②⑨《六帖》

③⑩《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

③①《尚书·说命》

③②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③③《尚书·盘庚》

③⑦《易·益》

③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期

④⑩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大收获》，《文物》特刊第26期。

④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④②马得志：《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④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④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周到等：《1957年秋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4963年第4期。

论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确立 和当时扬州地区流通过的铸币

秦子卿

商朝末年，最高统治者纣王（亦即最大的奴隶主）残暴地掠夺东夷各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扬州一带的淮夷族人，也参加了东方夷人联合反对纣王统治的武装斗争。《左传》中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即表明商纣王在镇压东夷的战争中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这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周武王伐纣的成功。所以周朝灭商（约公元前1027年）之后，为了安抚他们，让他们在此建立了干国。干，音hán，本有涯岸之义。用“干”做国名，正表明这个封国的地理特征是临近江海之滨。后来“干”字又加上偏旁“邑”，成为“邗”字，进一步显示出它的地理概念。而且直到现在，“邗”仍然是这里表示地名的专用名词。

邗国的都城，建立在胥冈之上。它西起观音山，东达小茅山，北到古雷陂之南，南临蜀冈南沿的长江古岸。这就是

最早的扬州城了。选择这里筑城，是因为蜀冈的坡势至此较为平缓，形成一片开阔的黄土地，既无水患又有水源，而且交社、灌溉较为便利，最适合古代人类居住和进行农业劳动。

邗国自西周初年建国起，在三百多年的经营中，经济情况基本上是比较稳定地向前发展的。而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却常常发生动荡。在公元前771年，被犬戎族攻破了首都镐京、西周覆亡。次年，平王被迫迁都洛邑，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进入春秋阶段，周王朝已受不到诸侯国的重视。很多诸侯拥兵割据，发展自己的经济，通用自己的货币，也不向周王朝称臣纳贡；或者打着“尊王”的旗号，迫使其他诸侯向自己屈服。于是有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的支配权，就不断发动兼并战争。这样，邗国就遭到长江南岸吴国的侵略。经过一番激烈的战争，邗国终于被吴国吞并。到了公元前468年，吴王夫差又在这邗国故都重修城池，开凿邗沟，以便由此进兵北上攻齐。邗沟开凿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军事运输，但后来对江淮南北经济交流，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条件。邗城处于邗沟入江之口，交通便利，货畅其流，也渐渐发展成为江淮地区的重要城邑，是南北商旅往来必经之地①。

到了战国初期。扬州一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公元前473年，吴国被南方的越国所灭，邗城因而被越国占领。越王勾践也利用邗城、邗沟屯兵运粮，北上与齐、晋诸侯争霸，受周元王之封然后南归。后来到公元前355年（一说是公元前334年）越国又被楚国吞并，这座古邗城就被划入楚国版图，并在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重修一次，取其

地“广被丘陵”之义，改名广陵。

楚国的广陵——扬州一带很注意开展农田垦殖，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农业产量。这时，广陵已能生产铁农具和铁兵器，农具的种类较前增加，牛耕也渐次得到推广。农业、商业和部分手工业奴隶已获得了人身自由，生产力得到发展，煮盐、捕鱼、织绦、竹木、皮革、漆器等行业，已陆续出现，而且都具有一定的生产水平。例如，漆器产品已采用先进的卷木和夹绦等技术成形，并掌握了一整套的彩绘工艺。今扬州博物馆珍藏着两件当地战国墓出土的夹绦胎彩绘圆漆盘，可以说明战国时期扬州漆器及其他相应的工艺都已具有较高的水平；如果它并非墓主亲自造的而是买的，那么它便是精致的商品了。这时其他各地的商品生产，也都有所发展，正如《盐铁论·本义》所追叙的：“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缁纈，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客观形势要求商品及其他物资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流，因而也促使商业兴旺起来，打破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隔阂。同时，各国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得到相应的发展。于是，以货币为媒介而进行商品交换的经济形态，至此亦正式确立。

就当时整个中国来说，在货币经济中，除了尚未退出流通领域的一部分实物货币外，主要则是金属铸币。各地的金属铸币概括起来，共有四大体系：（一）布币，由农具形成，原在三晋、三川地区铸造和使用，后又影响到燕国、秦国，故其主要流通区域南自河南，北抵辽阳，东达山东，西至陕西。但是，南方的楚国在后期也曾铸过银空首布和铜铲，其特点都是圆釜，与中原地区的方釜布币有所不同。

(二)刀货，由刮削工具演变而成，原来铸行于山东半岛（春秋时齐国），后来燕、赵等地的铸币也采用这种形式。

(三)圜钱，取法于纺轮，体圆而有孔，较之布形、刀形的铸币更便于携带和计数，更能适应商品交换日益频繁的需要。所以它一出现，很快便在北方布币、刀货流通区域中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并有逐渐取代刀、布而归于统一的趋势。

(四)金钣和铜贝，春秋时期行使于长江流域，进入战国以后，随着楚国版图的扩大而达于中原的陈、蔡、宋、鲁等地。它们是当时扬州流通的主要货币，下面特着重谈一下。

先谈金钣。与扬州有关的金钣已发现的有两种：一种钣面 3.5×3 厘米，大致呈方形，戳印有篆书“吴国菑郢”四字，四周有栏，中间用直线左右隔开。这种金钣，有人认为是南汉吴国所铸，因为出土于西汉的墓葬；我却认为可能是春秋吴国所铸的上币。另一种金钣基本也是方形，戳印有篆书“郢爰”（或“陈爰”等）二字，俗称“印子金”。“郢”即楚国国都，“陈”是楚国后期的都城）“爰”是货币单位，“郢爰”就是郢城铸造的楚国黄金货币。这类金钣均属称量货币，行使者可按需要而切割之。它不但是在楚国国内通用，而且也会流向其他国家。因为黄金本身就是各国上层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资材②，所以它在战国时期能行使“国际货币”的职能。例如解放后在陕西西安等地出土大量“郢爰”便是那时在秦国流通或贮藏楚币的证明。当然，郢爰在原楚国境内发现的更多：远自东晋、北宋时，就曾有人发现过③；近者如1972年、1978年两次在扬州市双桥公社堡城大队的楚广陵城遗址中曾两次出土，扬州市所属的仪征、宝应等地也出土过④。此外，扬州还出土过楚国的铜贝，即一般